

# 徐溥生平与政治思想初探

夏 斌

**摘 要:** 徐溥是明孝宗初年的内阁首辅,他前接成化乱局,后启弘治中兴。担任首辅期间,施以“镇之以静”的政治策略,努力维护国家政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处理与孝宗的关系中,始终以“正君德”为己任,孝宗多能虚心接纳,相得益彰。徐溥一生视“忠节”“仁义”为主臬,并作为其为人处世的宗旨,也被后世视为“贤相”的典范。

**关键词:** 徐溥; 首辅; 弘治中兴

**作者简介:** 夏斌,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K248.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6.02.011

作为明代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大臣,徐溥的仕宦经历十分丰富,弘治初年担任内阁首辅是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有《谦斋文录》四卷流传于世。目前学界尚无人以徐溥为特定对象进行专门研究,关于徐溥的事迹主要是在一些通史、断代史等著作以及通俗类读物中略有提及,这种状况相对于徐溥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来讲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对徐溥的研究,不仅可以对其本人有更加系统的认识,还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明代中期政局的了解。本文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希望对徐溥的生平事迹和政治思想进行初步探讨,倘有论述不周之处,望方家不吝指教。

## 一、徐溥的家世及入阁前经历

徐溥(1428—1499),字时用,号谦斋,谥文靖,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徐氏为宜兴望族,自唐宋以来代有显者,入元隐处田里而种德益深。”<sup>[1]</sup>到了明代,其祖父徐鉴始出仕。宣德时,徐鉴任琼州知府,琼州地处岭南一隅,开化较晚,鉴知琼州四年,“教民种艺,兴学校,民俗为之一变”<sup>[2]</sup>,当地数十年之积弊得到改善,深受乡民的爱戴。宣德九年(1434),徐鉴死于任上,时琼州百姓“远近闻讣,巷哭家祭,如丧所生……柩还,送者填塞海滨,目送其舟不见,乃还”<sup>[2]</sup>。后来,琼州当地为了纪念徐鉴,还为他立祠专祀。徐溥父徐琳,人称渔隐先生,“以冢子承家,克拓故业……长厚好义,为乡邦推重,且天性孝谨”<sup>[1]</sup>。时有族人拖欠官税,向其求助,“琳捐资代输”<sup>[3]</sup>。徐琳曾告诫年幼的徐溥:“吾族子姓皆祖宗一体,赍恤未备,吾心歉焉。”<sup>[3]</sup>在徐溥早年的求学和成长经历中,家族的影响对其个性形塑和志向规约发挥着不小的作用。

徐溥少年老成,“群儿在侧,不敢为口语嬉戏”<sup>[4]</sup>。他十分注重个人品行,从小就养成了自警的习惯,“徐文靖公少学时,性甚沉质,言动不苟。尝效古人以二饼贮黄黑豆,每举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黄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黄少,渐积参半,久之,黄者乃多。云:平生如是,虽贵不辍。”<sup>[5]</sup>另外,少年徐溥还有着远大的志向。“一日舅氏从外来,称他子弟善歌以诧公,公曰:歌曲能显亲扬名乎?若某所愿则异于是。”<sup>[4]</sup>

景泰元年(1450),徐溥以书经中应天乡试,却在会试中落榜。徐溥“益肆力于学,至忘寝食寒暑,

遂成痞疾”，依然“暗诵旧习不辍”<sup>[4]</sup>。景泰五年（1454），徐溥中殿试一甲第二名，以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正式进入仕途。

表 1 《明实录》记录徐溥入阁前政治履历表

项目	时间	任职情况
1	景泰五年（1454）三月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2	天顺元年（1456）三月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兼司经局校书（正九品）
3	天顺八年（1464）六月	左春坊左庶子（正五品）兼翰林院侍讲（正六品）
4	成化十年（1474）十月	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
5	成化十六年（1480）十月	太常寺卿（正三品）兼翰林院学士（正五品）
6	成化十七年（1481）二月	礼部左侍郎（正三品）兼翰林院学士（正五品）
7	成化二十二年（1486）十月	吏部左侍郎（正三品）兼翰林院学士（正五品）

明人为官视“入阁拜相”为极高荣誉，这是由明代内阁的特殊地位造成的。内阁虽然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有所差别，但是对于朝政庶务的决策影响还是十分广泛的。当时“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sup>[6]</sup><sup>1702</sup>，翰林院就是为朝廷培养高级官员乃至储相的地方。但是，翰林官的升迁却十分困难，时人称：“翰林之职清高固可喜，而淹滞亦可叹。”<sup>[7]</sup>徐溥在入阁前身居翰林院长达 33 年之久，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编撰重要典籍。成化三年（1467）八月，《英宗实录》修成，纂修前朝实录是新皇即位后的大事，参与纂修的官员一般会因此得到封赏和升迁，徐溥作为此次纂修官之一，也获得了白金 10 两、文绮 1 表里的赏赐<sup>[8]</sup>。第二，参与皇帝进学的经筵。经筵是为皇帝讲经论史特设的讲席，明代尤为重视。“经筵讲学，此实为君者之急务，为臣子者进言第一事也。”<sup>[9]</sup>天顺八年（1464）六月，礼部尚书姚夔等进经筵仪注，奏请开经筵，徐溥被宪宗选为经筵官<sup>[10]</sup>。第三，主持科举考试。徐溥为官四十余年，三典会试，分别是入阁前的成化十一年（1475）、成化十七年（1481）以及入阁后的弘治三年（1490），“前亦未之有也”<sup>[11]</sup>。第四，辅导太子。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立太子朱见深，徐溥已为司经局校书，是“以将立皇太子，先设官臣也”<sup>[12]</sup>。第五，其它临时性差事。如，成化二十年（1484）九月，山西等地大旱，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徐溥被派往灾区，“祭告西岳、西镇、西海并中镇、大河之神”<sup>[13]</sup>。

徐溥在翰林院、詹事府以及太常寺时，并没有接触多少实际政务，真正对朝局开始产生影响是在他入职六部之后，尤其是在担任吏部左侍郎期间，对当时的铨选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从李东阳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些端倪：

“改吏部佐理铨选，清慎有加，久之资望，并积而为当道所忌，宪庙有意柄用之，未果也。”<sup>[11]</sup>

李东阳是当时的朝廷官员，他的记载有着较高的真实性。成化时期，明宪宗很少关心朝政，导致宦官、佞幸、外戚弄权，而内阁万安、刘吉等人不仅对此逆来顺受，还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兵部尚书马文升等人相继被贬，而其他六部官员多无所事事，徒有虚名，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谑。而徐溥当时在吏部还能做到以贤鉴人，恪尽职守，这在六部堂官之中确是难能可贵。成化政局的腐败，使得马文升、徐溥等正直官员难以受到重用，这也是特殊的时代背景所限。

二、徐溥与孝宗朝政治

孝宗即位后决心改变宪宗朝留下来的政治烂摊，于是首先整顿吏治。他一方面罢斥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裁汰传奉官，革法王、佛子等封号，另一方面重新起用王恕、马文升等人入六部主事。孝宗还对内阁人事进行了调整，万安致仕，尹直被罢，徐溥和刘健入阁参与机务。内阁中

三人,刘吉留任,而徐溥、刘健都在朝中享有清誉,“是时,吉于阁臣居首,而同列徐溥、刘健皆正人,故两人有论建,吉亦署名”<sup>[14]</sup>。弘治五年(1492)八月,刘吉被罢,徐溥即为首辅。

弘治初是明代由成化危机走向弘治中兴的重要过渡阶段。徐溥任首揆,辅弼参谋,积极发挥内阁的中枢作用,在政治上主张“镇以安静,务守成法”<sup>[15]</sup>,一改成化朝的混乱局面,使得“中外咸宁,海内和平”<sup>[16]</sup>。徐溥“镇以安静”的政治思想更早可以追溯到东晋王导的“镇之以静政策”,二者异曲同工,都是在强调国家的安定,这个策略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是合乎时宜的。关于守成之义,孟森先生曾说:“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sup>[17]</sup>实际上,徐溥之务守成法不在谨守法度,而是修明制度。这种政治思想在他的为政事迹中都能有所体现。

### (一) 慎守成法,修明制度

弘治五年(1492)八月,孝宗命革职官员李华为昌国公张峦选择墓地,在没有经过正常选官程序的情况下,直接恢复了李华钦天监监正的职务。弘治初,孝宗即已裁汰传奉官,而“李华复职”又使得这一弊政重生,引起了大臣们的警惕,“忽然传出着复职管事,未免惊骇众听”<sup>[18]</sup>。徐溥上疏孝宗,指出了复职事件背后将会带来的危害:“凡百除授升迁,俱是合于衙门题奏请旨,未有自内传出者,今又辄开其端,诚恐奔竞干请之徒纷然而起,后来难以止塞,其于治道不无有损……幸门一开,则引例希求者无所不至矣。”<sup>[18]</sup>徐溥还劝诫孝宗:“君子作事谋始,盖凡事谋于其始,则易为力。”<sup>[18]</sup>徐溥的意见最终被孝宗采纳,有效地制止了传奉官在弘治朝的蔓延。虽然终孝宗一朝都没有完全取缔传奉官,但是以徐溥为首的廷臣所传递出的强硬态度,也使得传奉官没有像成化朝那样酿成巨祸。

明代的庶吉士制度草创于于洪武时期,永乐时确立了庶吉士的培养方式:从新科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拔庶吉士,培养三年,优者留为翰林官,次者出为科道、六部主事等官。庶吉士是明代阁部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是一直以来,庶吉士的考选制度并不严谨。弘治六年(1493)四月,兵科给事中涂旦就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sup>[6]1701</sup>。徐溥进一步指出庶吉士的考选时间、方法、条件等都无定制,对此,他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第一,考选时间。“一次开科,一次选用。”<sup>[19]</sup>第二,考选方式。新进士录平日所作文字15篇以上,呈礼部送翰林院考订,择优行取,然后礼部与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其中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sup>[19]</sup>。第三,考选人数。“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sup>[19]</sup>孝宗同意了这个方案,“命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sup>[6]1701</sup>。徐溥对于“祖制”没有墨守陈规,相反,他的改革措施使得庶吉士制度渐趋完备,一科一选的定制也一直延续到嘉靖二年<sup>①</sup>。

### (二) 镇之以静,两情自安

弘治八年(1495)八月,周太后以年高欲召崇王朱见泽入京。明代“诸王分封后,不得再入朝”<sup>[20]</sup>,即使是“奉旨入朝,原非常例”<sup>[21]</sup>。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防范藩王威胁到皇权。徐溥强烈反对崇王入京,“盖以母子之情,一时之私;朝廷之计,天下之公。故宁拂私情而存大计,此诚圣子神孙万世所当法也。”<sup>[21]</sup>。明代藩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sup>[22]</sup>,虽然没有多少实权,但仅“食禄”一项就给明朝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除此之外,皇室经常还要赏赐藩王财物,“亲王之国,朝廷笃念亲亲,恩礼加厚,船只车辆倍于往时,加以辅导,非人罔知约束”<sup>[21]</sup>,藩王多贪得无厌,比如这个崇王就曾“乞河南退滩地二十余里”<sup>[23]</sup>,需求无度,令人惊愕。另外,藩王还有在入京沿途搜刮扰民的恶习,“需求财物,夹带私盐,所过地方,贻害非细,官吏惶惧,人民怨嗟”<sup>[21]</sup>。徐溥还指出:“今国用繁重,府库未充,天灾流行,民力已竭。”<sup>[21]</sup>此时如果召崇王入京,徒费无益,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礼部尚书倪岳

① 《明史·选举二》载:“自嘉靖癸未至万历庚辰,中间有九科不选。”按:嘉靖癸未为嘉靖二年,因此一科一选的定制最早也是在嘉靖二年才被打破。

等也劝谏孝宗“若苟顺一时之情，取王来京，人民骚扰，国势动摇，则亦将有不利于王矣”<sup>[24]</sup>。于是周太后和孝宗撤回了旨意。

安南与占城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安南为占城患已非一日。”<sup>[25]</sup>永乐以来，明朝政府“累降玺书，曲垂海谕”<sup>[25]</sup>，以书面的形式调解两国纠纷，本着安、占皆“不征之国”的原则，并未采取军事干预。弘治八年（1495）十月，占城再次上诉安南，乞求明朝遣大臣往为和解，当时廷臣建议如旧例谕令安南即可，但孝宗仍“意欲遣官”<sup>[26]</sup>。为了劝说孝宗放弃这一想法，徐溥从历史到现实，说明此举是不合时宜的。他指出宪宗朝就曾让两广地方官为之调解，朝廷大臣代表的是中央王朝，安南一旦“执迷抗命”<sup>[27]</sup>，便会损害明朝作为宗主国的威严，甚至导致问罪兴师，则后患愈大。而且当时明朝西北边疆还出现了“哈密危机”<sup>①</sup>，如果明朝介入安占冲突，可能引火上身，威胁到南疆局势的稳定。徐溥还援引《春秋》“王者不治夷狄”以及洪武祖训里“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sup>[27]</sup>的观点来加以论证，最终使得孝宗改变了初衷。

（三）劝谏启沃，辅养君德

作为内阁首辅，徐溥还履行着“辅养君德”的职责。孝宗自弘治八年后在朝政方面日渐懈怠，甚至染上崇道之风。弘治八年（1495）十二月，孝宗命司礼监递出祭祀三清乐章，要求内阁对其改补进呈，徐溥认为“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说”<sup>[28]</sup>，并不在太祖亲制的祭祀对象之中，且内阁是“谋议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原、弼正阙失”<sup>[28]</sup>的地方。鉴于徐溥等人态度坚决，孝宗修改三清乐章的命令最终没有实行。与“谏撰三清乐章”形成鲜明对比，徐溥在同年七月曾奏请追封宋儒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孔庙<sup>[29]</sup>。徐溥崇儒抑道是弘治初士大夫厘正祀典活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对维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有着积极作用。徐溥还对孝宗“视朝渐晚”“迷信斋醮”等陋习作了规劝，孝宗多能虚心接纳。

表 2 《明实录》记录徐溥内阁所上“劝君德”类奏疏<sup>②</sup>

项目	《孝宗实录》所记载时间	奏疏主题	项目	《孝宗实录》所记载时间	奏疏主题
1	弘治八年（1495）六月	“黎明视朝疏”	4	弘治十年（1497）二月	“论勤政讲学疏”
2	弘治八年（1495）十二月	“谏撰三清乐章疏”	5	弘治十年（1497）三月	“勤政刚断裁决疏”
3	弘治九年（1496）六月	“论勤政疏”	6	弘治十年（1497）四月	“勤政疏”

这一时期还应注意的是内阁地位的提升。早在弘治初年，孝宗就定义邱濬班列王恕之前，时王恕虽是吏部尚书，六部之首，但是礼部尚书邱濬却身兼阁臣，可以说这时的内阁地位在形式上已经超越六部。尽管如此，内阁依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视。弘治十年（1497）二月，徐溥在奏疏中劝谏孝宗召见阁臣：“本朝列圣，自洪武以至天顺年间，时尝面召儒臣，咨议政事。今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所以通达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时断决，其于政体，实为有碍。”<sup>[30]</sup>一个月后，孝宗召徐溥、刘健、李东阳和谢迁至文渊阁议事，这是孝宗即位以来第一次召见阁臣，也是成化七年以来的第一次，“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谓为盛事。”“是成化七年至弘治十年，两朝天子与廷臣不相见且二十五年也。”<sup>[31]</sup>虽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sup>[15]</sup>，但是却开启了孝宗面见阁臣的先例，提高了内阁的辅政地位。

三、徐溥的儒家道德观

有明一代，统治者将程朱理学立为官方哲学，希望将其倡导的封建道德观念，自上而下，教化于民。

① 此事件在田澍《明代哈密危机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已有详尽的论述。

② 参考翟爱玲《明代名臣刘健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117页之表格整理而成。



而士大夫阶层则有意无意地成为了推行教化的重要媒介,其自身的道德观念以及相关活动都是宣传教化的重要内容,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

### (一) 表彰忠节,置办义田

洪武初,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困守云南,明太祖想要和平解决问题,于洪武五年(1372)、八年(1375)先后遣翰林侍制王祎、湖广行省参政吴云诏谕梁王,不果,二人皆持节死于云南。建文中,朝廷“赠(王祎)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sup>[32]7415</sup>,但是吴云却一直没能得到朝廷的追谥,其事迹甚至不为后人所知。徐溥“少则闻先君论公使事,而心向慕之”<sup>[33]</sup>,他认为“自古忠节之士,史必有传,庙必有祀,所以表其贤,报其功,惟恐其人泯没于世,此人心之所公也”<sup>[33]</sup>,于是他将为吴云表彰忠节的想法告知时任云南巡抚王诏,“诏以为己责,为奏请于朝”<sup>[33]</sup>。弘治四年(1491)五月,朝廷赠吴云“刑部尚书,谥忠节,与祎并祠,改祠额曰二忠”<sup>[32]7417</sup>。

徐溥发起的这场表彰忠节的活动,不仅是代表国家推行忠节观的举措,同时也彰显了徐溥个人对忠节观念的认同。徐溥的忠节观由父启之,而他晚年置义田、设义庄同样是受到其父宗族观念的影响。

创建义田、义庄是封建士大夫维护宗族利益的积极行动,明清时期更为流行,这与当时宗族意识强化和宗族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吴宽在《徐文靖公义田记》中有云:“公少时登甲科入翰林,已受教于其先渔隐府君,有意于义田之举矣。”<sup>[34]</sup>后来徐溥官至内阁首辅,“至是禄赐益厚,终不欲私以自奉也”<sup>[34]</sup>,于是决定置义田赡养族人。弘治六年(1493),其子徐元相在宜兴置义田八百亩,设立义庄,并制定了详细的规约:“老者颁以绢,寡者衅以粟,幼不能读者送之塾,贫不能娶者助之财,死无所归者为之敛。”<sup>[35]</sup>徐溥担心后世子孙破坏义田,遂上《奏为乞恩请命保守义田事》,“奏请于朝下,其事于郡县有不如规约者,得官法治之”<sup>[36]</sup>。后来,徐氏义田又增置一千亩,到清代嘉庆时历经十余世,“子孙食其德不衰”<sup>[35]</sup>。清人胡宪言盛赞徐溥义田之举:“继父之志而成其事者,孝也;彰君之赐而为义举者,忠也;赡给族人而周其惠者,仁也。”<sup>[37]</sup>

### (二) 调剂言官,爱护人才

明代的言官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虽然品秩不高,但是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言官可能会因“言”获罪入狱,甚至被杀,虽然部分言官是为了个人恩怨或者打击政敌,但是大多数言官还是能够恪守节操,秉公直谏。徐溥曾多次施救入狱的言官,“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sup>[15]</sup>。

孝宗即位初,更新庶政,广开言路。御史汤鼐劾阁臣万安、尹直和刘吉,“刘独留,恨鼐”<sup>[38]</sup>。弘治三年(1490),刘吉诱御史魏璋劾汤鼐,“能去鼐,升金都御史。”<sup>[38]</sup>于是刘璋上疏劾汤鼐与寿州知州刘槩妄言朝政,并连同庶吉士邹智一同下狱,“当事者恨公,坐公鼐槩妖言惑众,罪死”<sup>[38]</sup>。刑部侍郎彭韶辞不判,徐溥也劝谏孝宗:“吾辈不可使朝廷有杀谏臣名。”<sup>[39]</sup>乃获免。弘治九年(1496),武冈州知州刘逊“以事忤岷王,王讦奏之,逮系锦衣”<sup>[40]</sup>,科道官庞泮、刘绅等交奏论救,“上震怒,并逮系之”<sup>[40]</sup>,御史张淳和徐溥抗疏申救,徐溥谏言:“官本欲为国而概治之,其如尽忠何?”<sup>[41]</sup>上乃释之。万历年间,刑部主事王德新在论及此案时说:“且无张淳、徐溥等之速救,谁不为之扼腕?非惜言官也,为国之大体惜也。”<sup>[41]</sup>明代士大夫视言官为天子耳目,群臣为天子股肱,揭示了君臣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君臣冲突时有发生,且群臣多处于不利地位。徐溥积极挽救入狱官员,对维持君臣和睦的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即“培养国家元气,又不在彼而在此也”<sup>[16]</sup>。

另外,徐溥在用人方面也有着独特的眼光。弘治七年(1494)八月,徐溥以文职诰敕无专官管理,推荐由李东阳负责。“今惟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文学优赡,兼且历任年深,乞量升一职,令在内阁专管诰敕,庶委任专一,事不稽误。”<sup>[42]</sup>一年后,李东阳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徐溥十分欣赏李东阳的才华,史载:“溥能任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属李东阳,而溥因事纳

忠，随才器使。”<sup>[43]</sup>另一位阁臣谢迁则是徐溥的门生，谢迁是成化十一年的状元，而徐溥则是那年的会试主考官。“公前后三主礼闱，所得多天下名士，公未去位时，已多跻显位，余姚谢公则与公同升内阁矣。”<sup>[4]</sup>内阁之外，如王鏊、杨守阯等名臣都曾受到徐溥的举荐<sup>[44]</sup>。徐溥用人“言不必出诸已，惟其是；用人不必所知，惟其才”<sup>[45]</sup>。“在相位数年间，六部多得其人。”<sup>[43]</sup>《玉堂丛语》对弘治君臣有一段描述：

徐谦斋作相，终始孝庙一朝，当时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盖一时正人如王端毅、马端肃、刘忠宣、倪文毅、张东白、杨文懿、张庄简、韩贯道诸人，布列六曹，戴简肃掌都察院事，章枫山、谢方石为两京祭酒。百僚师师，真可谓朝无倖位，野无遗贤，虽则主上明圣，而谦斋之休休有容，诚有所谓“若己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孝庙十八年太平之治。<sup>[46]</sup>

后世对于弘治中兴多有溢美之词，可是相比较前后几代，确实有着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君臣和睦的时代特征，而包括徐溥在内的士大夫群体，对于营造这一中兴局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弘治一朝的政治特色。

## 四、结语

徐溥是影响明代中期政局的一位重要人物。弘治初，徐溥担任内阁首辅期间，采取“镇之以静、务守成法”的政治策略，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努力维护安定的政治氛围，并在此基础上改革时弊，修明制度。徐溥对内继续打击传奉官弊政，改善庶吉士考选制度，努力减少藩王对明朝财政的损害，对外积极避免明朝政府陷入安占纠纷之中，这一系列政治举措对促使明王朝走出乱局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理学之臣，徐溥的儒家道德观十分丰富，是其人格塑造的重要源泉。他以“正君德”为己任，敦促孝宗勤政；大力倡导忠节观，引领社会风尚；爱护宗族，以仁义为本。徐溥秉持“任人唯贤”的用人观，对营造弘治朝积极的政治生态多有裨益。

### 参考文献：

- [1]（明）徐溥. 徐文靖公谦斋文录·卷3·新建祠堂记 [M] //明人文集丛刊.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292.
- [2]（明）邱浚. 重编琼台稿·卷24·明故琼州府知府加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公神道碑铭 [M] //文津阁四库全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6.
- [3]（明）毛宪. 毗陵人品记·卷7 [M] //中国古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316.
- [4]（明）吴俨. 吴文肃摘稿·卷4·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文靖徐公行状 [M] //四库明人文集丛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425.
- [5]（明）焦竑. 玉堂丛语·卷1·行谊 [M]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1：9.
- [6]（清）张廷玉. 明史·卷70·选举二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明）黄景昉. 国史唯疑·卷3 [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8.
- [8] 明宪宗实录·卷45 [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939.
- [9]（明）孙旬. 皇明疏钞·卷8 [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52.
- [10] 明宪宗实录·卷6 [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55.
- [11]（明）李东阳. 怀麓堂集·卷84·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文靖徐公墓志铭 [M] //四库明人文集丛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882.
- [12] 明英宗实录·卷276 [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865.
- [13] 明宪宗实录·卷256 [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323.
- [14]（清）夏燮. 明通鉴·卷36 [M]. 北京：中华书局，2013：1435.
- [15]（清）张廷玉. 明史·卷181·徐溥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805.

- [16] (明) 雷礼. 国朝列卿纪·卷 11·内阁行实 [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86.
- [17] 孟森. 孟森明史讲义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54.
- [18] (明) 徐溥. 徐文靖公谦斋文录·卷 1·题为发下揭帖复职事 [M] //明人文集丛刊.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64.
- [19] (明) 徐溥. 徐文靖公谦斋文录·卷 1·奏为考选庶吉士事 [M] //明人文集丛刊.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93.
- [20] (明) 何乔远. 名山藏·卷 36 [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34.
- [21] (明)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卷 65·止崇王朝见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552.
- [22] (清) 张廷玉. 明史·卷 120·诸王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659.
- [23] (清) 张廷玉. 明史·卷 183·周经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860.
- [24] 明孝宗实录·卷 102 [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1873.
- [25] (清) 张廷玉. 明史·卷 324·外国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390.
- [26] 明孝宗实录·卷 105 [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1922.
- [27] (明)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卷 65·论占城安南事宜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552.
- [28] (明) 徐溥. 徐文靖公谦斋文录·卷 1·奉命撰三清乐章奏 [M] //明人文集丛刊.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86.
- [29] (清) 夏燮. 明通鉴·卷 38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478.
- [30] 明孝宗实录·卷 122 [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2179.
- [31] (清) 赵翼. 陔余丛考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328.
- [32] (清) 张廷玉. 明史·卷 289·忠义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3] (明) 徐溥. 徐文靖公谦斋文录·卷 2·吴尚书忠节录序 [M] //明人文集丛刊.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210.
- [34] (清) 卢文弨. 常州八邑艺文志·卷 3·义田记 [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36.
- [35] (清) 阮升基. 宜兴县志·卷 8·行谊补编 [M] //中国方志丛书.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357.
- [36] (明) 徐溥. 徐文靖公谦斋文录·卷 1·奏为乞恩请命保守义田事 [M] //明人文集丛刊.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70: 60.
- [37] (清) 阮升基. 宜兴县志·卷 10·义庄记 [M] //中国方志丛书.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457.
- [38] (明) 焦竑. 熙朝名臣实录·卷 21·吏目邹公 [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47.
- [39] (明) 邓元锡. 皇明书·卷 22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290.
- [40] (明) 陈建. 皇明通纪集要·卷 24 [M] //四库禁毁书丛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280.
- [41] (明) 吴亮. 万历疏钞·卷 6·乞广言路节权幸以定国是疏 [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40.
- [42] 明孝宗实录·卷 91 [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1672.
- [43] (明) 徐学聚. 国朝典汇·卷 32 [M]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书丛书.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666.
- [44] 明孝宗实录·卷 98 [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1808.
- [45] (明) 何乔远. 名山藏·卷 68 [M]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8.
- [46] (明) 焦竑. 玉堂丛语·卷 3·荐举 [M]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97.

## A Study of Xu Pu's Life Activities and Political Thoughts

Xia Bin

**Abstract:** Xu Pu was the grand secretary in the imperial court during the early ruling years of Ming Xiaozong. He took this position after Chenghua Crisis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lourishing of Hongzhi times. During his career, he adopted a moderate and mild political policy, maintaini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m, he responsibly insisted that imperial merits were the priority and Xiaozong accepted his proposals delightedly. Throughout Xu Pu's whole life, he put faith, honesty, and morality on top positions, regarding these merits as his life principles. He was praised as a noble model of a good mister.

**Key words:** Xu Pu; grand secretary; the flourishing of Hongzhi times

(收稿日期: 2015-12-01; 责任编辑: 沈秀)